


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 万新平 主编

天津工艺美术史

The History of Arts and Crafts in Tianjin

章用秀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总序

万新平

盛世修史是我国的文化传统。编纂《天津通史》是天津市广大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期盼已久的文化盛事。2004年12月,在纪念天津设卫建城600周年之际,《天津通史》编纂工作正式启动,这是跨入21世纪后天津历史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划时代的文化建设工程。

《天津通史》作为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重大研究项目,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唯物史观为主导,完整把握天津历史发展的脉络,全面分析天津历史变迁的特征,深入总结天津发展的规律,深刻论述天津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项工程对进一步推进天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发展,进而提高天津城市文化品位,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编纂地方通史历来是一个地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近年来,地方通史编纂工作方兴未艾,北京、上海、重庆、河北、山东、山西、湖北、贵州等省市都相继编辑

出版了大型地方通史。天津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有许多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特点。在古代,天津从军事重镇逐步成为畿辅名城,具有中国封建城市发展的典型意义。在近代,天津是近代中国的缩影,所谓“近代中国看天津”就是对天津近代重要历史地位的一种通俗的概括。比如,天津是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战略要地,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重要战场,是近代中国政治势力角逐的主要舞台,是近代中国海陆军建设的重要基地,是中国北方城市近代化的发源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白区革命斗争的重要中心,是中国北方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口岸和工商业经济中心。中西社会思潮在此交汇,新式文化教育由此兴起,一批思想家、教育家和文人巨匠聚集津门,从而形成汇纳百川、包容中外的社会人文环境和历史文化积淀。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天津克服了发展中的种种艰难曲折,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显著成就。改革开放以来,天津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指引下,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求真务实,团结奋进,努力建设国际港口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宜居城市,不断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天津正在迅速崛起,成为推动环渤海经济圈发展的强大引擎。

回顾历史,在中国社会由一个建基于古老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社会,逐步向以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天津占有突出的地位,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拥有极为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中国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成就与局限、经验与教训、发展与曲折、突破与障碍,都集中反映到天津这一历史文化名城身上,使天津的演变成为中国城市变迁的重要代表。通过编纂《天津通史》,对天津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仅可以深入地研究天津、认识天津、展示天津,而且可以更深入地研究中国、认识中国、展

2 示中国。

编纂《天津通史》，是一项凝聚集体智慧和力量的系统工程，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升华和提高，是在新的起点上的开拓和创新。所以，必须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力求在理论构架、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史实资料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必须组织一批素质优良、功力深厚、作风扎实的专家学者集体攻关。因此，从专题研究着手，从基础资料起步，是做好该工程的基本路径。要坚持对天津历史发展进程进行全方位、综合性的研究，把各个时期、各个阶段天津地区变迁的历史全貌，真实地加以展现和记述，深入地总结天津城乡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发展进程。不仅要研究和叙述天津的规模、形制、建筑和环境，更需要研究和分析其经济特征、文化渊源、社会结构、人口变化、居民素质等发展和演变的内涵；不仅要注重天津与周边地区，乃至与华北、西北、环渤海地区的关系和互动，还要关注天津与国内其他区域中心城市、东北亚地区乃至世界各国的相互关系；不仅要着重叙述天津本身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诸方面的演变史实，并从中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还要反映出不同时期天津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要高度重视天津历史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应该看到，前人已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天津历史资料，但从编写大型多卷本通史的需要来看，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如历代实录、通鉴、类书、文集、方志中有关天津地区的史料，开埠以来各个时期的大量档案文献，特别是散失在国外档案馆、图书馆收藏的有关天津的外国租界、领事馆、教会活动的文件、报告、调查和私人日记、信件等，近现代中外文报刊中关于天津的记述，以及反映天津历史的考古和现存文物资料等，都需要进行全面系统的征集整理工作，以使《天津通史》编纂工作建立在坚实完备的史料基础之上。

为此，我们根据《天津通史》编纂工作的需要，将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天津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汇编为“天津通史专题研究丛书”；将经过专家整理的较为珍贵的中文历史档案和文献资料选编为“天津通史资料丛书”；

将征集到的有重要价值的外文历史档案和书刊资料编译为“天津通史编译丛书”。这三种丛书的编辑出版,不仅有利于提高《天津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工作水平,同时可以把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及时介绍给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对深入地了解天津,认识天津,研究天津,将发挥积极的不可或缺的作用。

自序

天津市位于华北平原的东北部，东临渤海，北屏燕山，南北长 189 千米，东西宽 117 千米，面积 11760.26 平方千米。它对内辐射三北地区的 13 个省市自治区，对外面向东北亚。它是中国环渤海湾经济圈的中心、华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商品集散地、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中国北方最大的沿海开放城市。

天津是中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文化艺术源远流长，工艺美术丰富多样。根据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考证，早在公元前 6000 年左右的新石器时期，天津地域就已出现雕塑、彩陶和陶塑造型艺术；夏、商、周时期，出现了彩绘陶、青铜纹饰和金文；汉代有漆画、石刻艺术出现；北魏及隋、唐时期，出现了精美的铜铸像和画像石；宋、金以后，天津成为漕运中心，文化艺术活动日趋活跃。自明初设卫建城以来，凭借着河海联运的优势地位，天津迅速崛起为商贸重镇，在经济走向繁荣的同时，也逐步形成地域性明显的工艺美术品类与制作。进入 19 世纪中叶以后，天津作为中国开埠最早的城市之一，成为近代中国追逐时代潮流的先锋和中西文明的荟萃之地。天津拥有杨柳青年画、泥人

张彩塑、魏记风筝以及刻砖、木雕、剪纸等多姿多彩的民间艺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在这里交汇、碰撞、融合、升华,形成了天津文化艺术多元性、开放性、包容性的显著特征。百行杂作,五方杂交,地处京畿,西学东进,在这种客观条件和社会背景下,近现代天津工艺美术明显受到宫廷美术、文人美术、西方艺术、市井民俗、市民欣赏需求诸多因素影响,呈现一种雅俗共赏、注重写实、表现手法细腻传神的特点,同时不断吸收新方法新工艺,展示出丰厚的文化底蕴、鲜明的民俗色彩,广泛的群众基础,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工艺美术事业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为了将民间工艺发扬光大,20世纪50年代,先后成立天津“泥人张”彩塑工作室、杨柳青年画合作社及工艺美术设计院等,大搞艺术研究和改革,扩大工艺美术范围,增加了蜡像、面塑、根雕等新品种,涌现出一批成就卓著的工艺美术工作者。自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至1995年,仅天津市工艺美术设计院就培养出各种工艺美术人材三千多名,承接、完成商品包装和市政园林美化设计等工程项目一百多项。

本书以天津工艺美术的历史沿革为主线,将天津的工艺美术与天津的历史文化、中国工艺美术发展史的结合上加以探讨,把天津工艺美术的发展放在中华文化的大背景中,并从天津的空间地缘入手,阐释由河海经济特别是漕运和盐业所孕育出的具有天津地方特色的文化艺术,勾画出天津工艺美术的发展历程、艺术成就及在全国的地位,全面客观地介绍天津工艺美术的起始渊源、文化传承、风格演变、技术进步、产品发展等的情况,记述天津工艺美术与地域环境、文化艺术、科技水平、经济发展之间的美系,展现天津工艺美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反映的文化与经济、材料与技艺、科技与工具、艺术与生活、实用与审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容。全书分为三章。第一章主要是讲述天津古代的工艺美术。简略说明历史上天津的行政区域和行政区划的变迁情况,及与天津工艺美术发展的关系;按

历史脉络对不同时期天津地区的工艺品制作、品类和特征做出分析。第二章讲述近现代天津的工艺美术,重点阐释天津开埠以来,洋务新政、北洋新政的推进,为工艺美术制作提供的发展契机,天津工艺美术所呈现的多元、开放、求精、图变的艺术取向、滨海城市的市井色彩;记述并剖析了日本侵华时期天津工艺美术事业遭受的侵扰。第三章讲述当代天津的工艺美术。重点讲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工艺美术得到复苏并取得长足的发展,同时也记述 21 世纪初一些工艺美术企业面临的困境、政府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的举措。

本书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崔锦、韩嘉谷、缪维信诸先生的启发和帮助,书中也吸收了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借此谨向以上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章用秀

目录

第一章 天津古代的工艺美术(1840年前)	1
一 概说	1
二 新石器时代	4
三 夏商周时期	8
四 春秋战国时期	10
五 秦汉时期	13
六 魏晋至唐代	17
七 辽宋金时期	22
八 元代	28
九 明代	32
十 清代早中期	41
第二章 近现代天津的工艺美术(1840~1949)	56
一 概说	56
二 近代多元文化影响下的民间工艺	60
三 北洋新政与工艺美术	83
四 民国时期的工艺美术	96
第三章 当代天津的工艺美术(1949年以来)	111
一 概说	111
二 手工业恢复和迅速发展期(1949~1957)	116
三 转厂过渡和三年调整期(1957~1966)	124
四 “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	130
五 稳步发展三年期(1977~1979)	133
六 改革开放时期(1979~1999)	136
七 21世纪前十年(2000~2010)	149
参考文献	163

第一章

天津古代的工艺美术(1840年前)

一 概说

天津简称津,别称津沽、津门,东临渤海,为海河五大支流汇流处。今辖和平、河北、河东、河西、南开、红桥、东丽、西青、津南、北辰、武清、宝坻十二区和滨海新区及蓟县、静海、宁河三县。全境绝大部分属华北平原,北部为燕山山地。山、原、河、湖、海,地貌多样,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这里天然地成为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而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又铸就了天津独特的历史特点和文化内涵。

天津“郡新而地古”^①。其得名虽在明朝初年,但地域历史悠久,文化艺术源远流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考古部门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多次普查、发掘所获取的大量资料表明,早在原始社会,天津地域即已出现雕塑和彩绘艺术,而商周时代的青铜纹饰、金文,又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艺术历史的悠久和内涵的丰富,以及先民的聪明才智和审美情趣。从已出土的前、中、晚期原始雕塑、陶饰、彩陶,夏末至商前期彩绘陶,商末周初的

^①(清)吴廷华:《津门杂事诗序》,《梓里联珠集》,天津古籍出版社,第3页。



青铜纹饰，西周中期饰有凤鸟纹或饕餮纹的青铜礼器，战国时期刻绘有鱼、鸟动物纹和山形纹的陶壶及兽纹瓦当等可以看出，先秦时期天津地域内的工艺美术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自西汉开始，天津平原被纳入中国郡县制行政体制，在海河南北分别建立了东平舒县和泉州县，天津在新生的封建制度下得到迅速发展。西汉晚期，天津平原发生过一次海侵，东汉末年海河水系形成。汉代的画像石、碑刻，出土的北魏时的铜造像，唐代的摩崖石刻、陶乐俑等反映了西汉至唐代的经济、人文意识和工艺美术的发展状况。

北宋辽金时期，天津地区的雕塑工艺等尤为出色。海河是北宋与辽的界河。海河以北辽政权以幽蓟地区为农业基地，生产稳定，经济充实，佞佛的契丹贵族在此修建了许多大型佛教建筑。当时修建的坐落于今武清区、宝坻区、蓟县的寺院和佛塔内精美的雕塑和木雕展现了当时工艺之精美。渔阳县（今蓟县）重建的白塔，八角形基座上砖雕一周壶门，内镶乐舞伎图案砖雕，乐舞伎或手挥彩带翩然起舞，或弹奏琵琶、箏，或吹笙、笛、笙簧，或击拍板、方响、毛员鼓、县鼓。壶门上有砖雕斗拱和双重栏杆，栏板上雕宝相花和几何形图案。独乐寺^①重建后，观音阁内11面观音像，胁侍菩萨像和山门内力士像均重新彩塑。石刻经幢出现在今宝坻区。幢座底部方形台基四面雕佛经故事。台上置须弥座，束腰处刻壶门，内雕有佛像。

辽和北宋政权分别在1125年和1127年被女真族金王朝灭亡，天津地区结束长达两百多年的割裂局面，海河南北一起进入金的版图。金皇统年间在宝坻广济寺（建于辽）修建的石经幢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县城北的北台，是一处规模颇大的辽金时期基地，近年曾在此发现六角砖室墓，以及用石函作葬具的墓葬，出土有“金三彩”等许多珍贵文物。

^①坐落在今蓟县城西大街。始建于唐代，辽统和二年（984）重建，是中国古代木结构建筑的代表作。

元朝定都北京后,其军需民食均取自江南,漕运繁忙,又增加了海运。延祐三年(1316)改直沽寨为“海津镇”,派有重兵驻守。随着漕运和盐业的发展,南北通商,贸易兴旺,促进了文化艺术的交流,并传来闽浙一带的“妈祖文化”。坐落在三岔河口附近的天妃宫便创建于元代^①。《元史》卷三十、本纪第三十,泰定帝“三年八月,作天妃宫于海津镇”。泰定三年为公元1326年。从天后宫大殿梁架的勘察看,现有的大殿不仅是天津市区最古老的建筑实例,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妃、妈祖庙之一。

元代,在今天津市宝坻区出了一位鼎鼎大名的“雕塑奇人”刘元。刘元一生从事雕塑艺术近半个世纪之久。在中国雕塑史上,他自成一派,世称“刘銮法式”或“刘銮塑”。当时人们称他为塑像奇才,后世认为他的作品都是绝代精品。

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因明成祖朱棣经过而得名^②,并设卫筑城。正统元年(1436),卫学出现,自此,天津城市和文化艺术发展进入新阶段。明万历年间,津西杨柳青镇出现民间艺人用手绘制的年画;崇祯年间,出现了印制杨柳青年画的作坊;崇祯十二年(1639)出现了套色印刷。

明代,天津有涌泉寺、挂甲寺、镇仓关王庙、铃铛阁及文庙等。挂甲寺“栋宇嵯峨,象设赫濯”^③。铃铛阁建造奇特,“重檐迥出,风铃远闻数里”^④。

清代早中期天津工艺美术逐渐走向兴旺。特殊的地理环境、漕运的兴盛、以盐业为一大支柱的沿海经济及临近京都的地位,进一步推进了这里

^①后称天后宫,俗称“娘娘官”“娘娘庙”,主要供奉妈祖娘娘,在今天津市南开区古文化街。

^②建文元年(1399),封藩于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变”,在挥军南下途中,曾自小直沽渡南运河径取沧州。“天津”这个名字,应为明成祖朱棣所钦赐,即“天子渡河之地”的意思。1952年,天津南门外曾出土一块《重修三官庙碑》,碑文上刻有“我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由此济渡沧州,因赐名天津”字样。

^③(明)刘生甲《重建挂甲寺碑记》,(乾隆)《天津县志》卷之二十《艺文志》。

^④(民国)《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五。



工艺美术的制作。特别是盐商构建私家园林，延纳南北文人学者进行诗、书、画创作，同时也促进了工艺美术的交流与构筑。清乾隆年间是杨柳青年画的兴盛时期。著名的作坊画店有：戴廉增画店、齐健隆画店。此外还有“美丽”“廉增丽”“盛兴”“爱竹斋”“宪章”“高庆云”等画店相继开业。当时，杨柳青镇周围有三十多个村庄均从事年画创作和生产。这个时期，以业盐、漕船起家的“八大家”^①等富商豪门陆续建造豪华宅第，木雕、砖雕等作为建筑装饰艺术，雕刻细腻，工艺高超，成为天津工艺美术的重要类别，并涌现出多位雕刻高手。天津的民间工艺美术与同时代其他地方相比较，已明显形成自己独特的地方风格。

二 新石器时代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黄帝是中华民族的一位重要始祖。相传由黄帝率领下的部族奠定了黄河流域古老的民族文明的基石。大量史料证明，天津地区当年正是黄帝部族活动的主要区域之一。根据地质资料分析，考古工作者和学者们已经确认，历史上黄河至少有三次经由天津地区入海：第一次在商周时期（约公元前 17 世纪至前 8 世纪），在今天津市北郊，有一条向东延伸到汉沽的狭长洼地，便是此次由天津入海遗迹；第二次在西汉时期（前 206 ~ 25 年），黄河入海处在天津市东南的章武县附近；第三次在宋金时期（960 ~ 1232 年），黄河入海处在今天津泥沽。在商周以前，黄河由天津地区入海的时期更为久远。这就充分证明，天津地区是中华民

^①这里所称天津“八大家”是清朝咸丰以前的“八大家”。他们是天成号韩家、益德裕高家、杨柳青石家、土城刘家、正兴德穆家、振德黄家、益照临张家（即海张五）。这八家的发家，靠盐务的有高、杨、黄、张四家，靠粮业的有石、刘、穆三家，靠海船业的有韩家。后又有卞家、李家、华家、王家等。

族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

天津地区目前发现的原始文化遗存属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从距今 8000 年前开始,依次为距今 8000 年至 7000 年前的蓟县青池遗址二期遗存和蓟县下埝头遗址一期遗存,距今 6000 年前后的下埝头二期遗存,距今 5000 年前后的蓟县围坊遗址一期遗存,距今 4500 年前后的蓟县张家园第一类遗存,距今 4000 年前后的宝坻县牛道口遗址一期遗存等,这些遗存包含了年代跨度达 4000 年的天津地区原始社会信息。



图 1-1 蓟县青池遗址出土的陶罐

蓟县青池遗址,位于蓟县五百户镇青池村西侧,于桥水库南岸。青池第一期出土文物有石器和陶器两大类。石器制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件“石龙”,扁平环状,直径不足 5 厘米,一侧有未被完全割开的缺口,缺口上方的正、反两面都凿一小窝点表示眼睛,构成一条全身蜷曲、头尾相接的龙形图案,形象粗犷,线条简洁,整体造型和常见的红山文化“玉龙”相似,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原始文化艺术品。青池一期的陶器还略显原始,胎壁厚,质地较松,器类简单,只有罐、盆、钵等少数几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一种用作炊器的深腹罐,腹深而壁直,近似筒状,器表多施“三段式”纹饰,即先在口沿下饰数道弦纹,接着是一圈凸起的箍状带纹,再往下约占器表三分之二的面积施不规则的压印网格纹。

青池第一期遗存发现一件鸟形石雕工艺品,线条简单,趣味盎然。陶器的陶系以夹砂为主,颜色由红褐变成为灰褐,陶胎变薄,陶质坚硬。器表纹饰由连续横排的“之”字纹替代原先不规则网格纹和“三段式”布局,同时



图 1-2 蓟县青池遗址出土的蛇首形镂空陶器



图 1-3 蓟县青池遗址出土的之字纹陶豆

还出现一种由细密的“之”字纹带组成的卷云纹图案。筒形罐和钵仍是陶器群的主角,但有许多钵被加上了圈足,有的圈足做成高把,中段鼓起,下作喇叭口,类似高足杯。最具特征的是一种用于架高炊器的支脚,类似昂扬的蛇首,器身作筒状,下部有长方形镂空,这种器物开始时都是夹砂素面,制作粗糙,稍后变为粗泥质,饰弦纹、席形纹或羽状斜线纹,并有口、眼等的刻画,这似乎不是一般纹饰,应当兼具“艺术神器”的性质。宝坻县牛道口村出土一批玉、石器,计玉块 6 件,玉匕 4 件,石斧 3 件,石镞 1 件,石杖首 1 件,制作工艺皆十分精致,其中石斧造型具有青池二期文物的典型特征。

下埝头一期、二期遗存。下埝头遗址位于蓟县邦均镇,1988~1992 年发掘出土的可复原和大半复原的陶器近 40 件,石器 70 余件。石器有斧、镞等生产工具,磨盘、磨棒等谷物加工工具,圆盘状砍砸器,以及少量燧石打制的簇和刮削器。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两种,夹砂陶居多,手制,少数有慢轮修整痕迹。器表以素

面为主,也有弦纹、压印纹和少量“之”字纹。器类有釜、瓮、罐等,以及一定数量的支脚。泥质陶有盆、壶、碗和“红顶钵”,后者是在叠置烧制时由于氧化作用而使器口下形成一圈造红带,颇具特色,有的在器口偶见彩绘。陶器中有一件造型别致的器物,是在尖底瓶式陶器的腹部饰一周喙状突起,常见于河南安阳后岗一期文化及略早于它的磁山界段营类型、滕县北辛文化,年代在距今六七千年前,距考证是鼓的框架。

围坊遗址一期文化。围坊遗址位于蓟县城东 2.5 千米,1977 年发掘。其陶器基本上都是夹砂陶,颜色以红褐色为主,流行“之”字纹、指甲纹和锥刺纹,器类有罐、钵等。罐有敞口和直腹两种,敞口罐沿下饰指甲纹,器腹遍饰“之”字纹,有环耳。直腹罐实际上就是青池一期、二期的深腹罐,只是变得更加敞口,多素面,少数饰“之”字纹,常见在口沿下有一周堆纹。陶钵多敛口折肩,折肩处常见一道凹弦纹。石器有磨制石斧,以及用燧石打制的石镞和刮削器,石镞呈等腰三角形。和此相似的遗存还有青池三期和下埝头三期,也流行“红顶钵”,还流行刮条纹。这个器物群与辽西地区红山文化晚期特征相似,年代在距今 5000 年前。

1987 年,发掘蓟县张家园遗址时发现一种文化遗存,只有少量陶片,以泥质陶为主,另有一些夹云母屑陶,颜色有黄褐和灰褐两种,多素面,只有一片陶片在平行凹弦纹之间又填刻平行斜线纹。可辨器形有折腹盆、敛口钵、中口罐和筒形罐等。虽然出土遗物不多,却特征鲜明,与北京地区的雪山一期文化相似,和辽西地区被称作“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多有相通之处,年代在距今 4500 年前后。

到距今 4000 年前,天津地区和中原地区一样,也进入了考古学上的龙山期。宝坻牛道口、蓟县围坊、弥勒院等遗址,石器中最突出的是用燧石打制的石镞,平面呈等腰三角形,底边内凹。陶器以泥质灰陶和泥质黑陶为主,夹砂陶次之,陶质坚硬,陶胎薄,少数薄胎陶壁厚仅 2 毫米,多轮制;器表多素面,部分饰绳纹、篮纹和方格纹,个别有镂孔,可辨器类有夹砂绳纹



罐、泥质篮纹罐、瓮、杯、器盖等,另有板耳、桥形耳等残片,与相邻的北京昌平雪山遗址第二期遗存接近,属中原龙山文化系统。

以上表明,天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地区与北方文化交流的枢纽地带,天津新石器时代的工艺品制作具有多元多彩的特点。器物类型以石器、陶器为主,亦有玉器。石器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如刃部呈三角形的石耜和石磨棒等。陶器中夹砂陶占绝大部分,器口外部饰索状附加堆纹的较多。常见的纹饰还有弦纹、划纹、锥刺纹、指甲纹等。原始雕塑和陶纹饰出现在今蓟县青池村(新石器时代中前期),彩陶出现在今蓟县弥勒院、下埝头村(新石器时代中期),新的陶塑和纹饰,以及玉玦、玉匕出现在今宝坻区牛道口村(新石器时代晚期)。

三 夏商周时期

虽然有“禹贡黄河”沟通天津和中原夏朝之间的联系,而且《禹贡》还把这个地方纳入贡赋的范围,但各种资料表明,整个夏、商时期天津地区基本上都不在夏商政权的直接统治范围之内,属于北方阵容。进入西周,



8 图 1-4 蓟县张家园出土的陶罐

则按照初封时的疆界,以当时黄河尾间为界,今天津南部属齐,北部属燕,天津地区由此进入中原王朝的版图。在天津区划内发现的商周时代文化遗存有蓟县张家园和围坊等十多处遗址,所发现的遗存分上下两层。上层文化年代相当于晚商、西周时期,器物有交叉拍印的僵直绳纹,其高档柱状足大陶鬲、灰陶大口罐、直领折肩深腹罐、敛口钵、壶等。下层